

短视频赋能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信任纽带探究^{*}

陆杰华 张依芸^{**}

提要:在老龄化与数智化相互交织且城乡差异显著,以及互联网风险与信任再造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留意到短视频具有广覆盖、低门槛的使用特性,进而试图探究短视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2023年全国农村中老年人调查数据显示,农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群体占比79.64%,其中高龄老年人存在数字排斥现象,使用短视频相较于不使用短视频能显著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此同时,该效用存在年龄异质性,低龄老年人借助短视频能够有效缓解因社会角色退出引发的心理落差,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而这对高龄老年人与60岁以下的中年人而言并不显著。此外,就短视频使用内容而言,关注权威机构的农村中老年人能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信任在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显著促进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本文认为,需实施精准适老改造,开发方言交互、防误触等适老化功能板块;构建信任导向的治理机制,建立政务类、健康类权威账号白名单并实施算法加权推送;推动基层政务短视频账号建设,促进线上信任向线下参与转化,从而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关键词:互联网短视频 生活满意度 中老年群体 城乡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4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陆杰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张依芸,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研究背景

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 03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2.0%,首次突破3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 02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6%。老年人口规模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以及老年人口比例的急剧提升,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全局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中老年人融入了互联网时代的浪潮。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银发族”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来源。数据显示,我国新增网民742万人,其中50—59岁、60岁及以上群体分别占新增网民的15.2%和20.8%。《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其中“打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生活”“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帮助老年人、残疾人等共享数字生活”等表述,充分表明未来社会正朝着智能化、适老化方向迈进(新华社,2021)。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城乡中老年人群体在互联网使用和短视频使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截至2024年6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7.9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2.3%;农村网民规模达3.0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7.7%。因此,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交织的浪潮中,借助互联网发展成果弥合城乡发展差异与数字鸿沟、减少使用障碍,实现数字化技术在城乡地区的普惠发展,不仅是持续优化老年生活方式的现实需求,更是积极响应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下,短视频已成为我国新媒体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与传统媒体相比,短视频借助算法推送机制,依据用户的需求、偏好和兴趣进行定向推送,使特定内容以视频形式反复出现,进而实现价值观的传递(黎梦兵、吴勇,2020)。如今,“老龄”体现了人口基本结构的历史性转变,这意味着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等都需做出改变,其中包括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杜鹏、李子洋,2024)。所以,关注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本质上是对社会治理主体能动性的再次发现与激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借助网络进行社交、休闲和娱乐,这促进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入。然而,数字鸿沟限制了老年人获取信

息的全面性与时效性,影响其风险感知能力,导致老年人信息获取不平等,进而降低其社会信任(Gutiérrez et al., 2024)。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主流研究把社会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部分因子,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感受(Worchel, 1979),社会信任的降低会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Tang et al., 2024)。短视频制作门槛低、传播速度快、监管难度大,当社会公众置身于各种依据其偏好精准推送的短视频海洋中时,会使其丧失对某些不清晰事实的客观认知,从而潜移默化地认同短视频所传递的信息(黎梦兵、吴勇,2020)。此外,有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支持在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Cheng et al., 2024)。

在技术赋权与风险共生的背景下,为缩小城乡中老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亟须重构数字包容机制。综上,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农村中老年人的短视频使用如何通过社会信任影响其生活满意度?首先要回答,使用短视频是否会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其次,探究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群体使用短视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最后,探究短视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如何经由社会信任发生,即短视频使用会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老有所为”须同“老有所养”相结合,并提出了“技术向善”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2025)。本文运用全国性专项调查数据,结合数字代沟、社会活动理论与社会信任理论,相较于既有研究更深入地挖掘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内容,探索短视频使用这一日益普遍的互联网使用趋势,基于城乡二元分隔背景关注“数字鸿沟”中处于更为劣势地位的农村地区中老年人,以期更深入地探究既有研究中概化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增进中老年人福祉、推进积极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建设提供知识增量。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探究

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指标,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

于基本人口学特征、经济保障、代际关系与社会支持四个方面。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年龄、生理健康、性别、户口、婚姻状况等因素是影响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张霞、杨一帆,2017;刘建国、苏文杰,2022)。既有研究表明,年龄越大的老人,其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骆为祥、李建新,2011)。向运华等人(2017)的农村数据显示,自评健康是最稳定的预测因子,健康评价越高,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对退休生活的适应期更长,其生活满意度更高(刘吉,2015)。其中,性别差异存在城乡分化特征,农村男性比农村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李德明等,2008)。婚姻状况也显著影响满意度,有配偶的老年人因情感支持和共同居住而更满意(冯晓黎等,2005;李德明等,2006),丧偶者则面临更高的心理风险(李建新、骆为祥,2007)。

由此,学者们开始将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置于家庭视域之中。家庭代际支持是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核心因素,其中子女的经济支持、情感慰藉以及日常照料尤为关键(张文娟、李树苗,2005;郭志刚、刘鹏,2007)。具体来讲,子女孝顺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这是因为他们不仅能获得经济和生活照料方面的支持,还能满足亲情需求,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更是如此(郭志刚、刘鹏,2007;李建新、骆为祥,2007;张文娟、李树苗,2005)。此外,子女与老年人的情感交流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周坚、何梦玲,2019;同钰莹,2000)。

积极老龄化理念强调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心理状态具有积极作用,将老年人视为更具能动性的“社会”群体,通过“老有所为”实现“老有所乐”,进而提升归属感与生活质量。进一步而言,社会参与被细分为多个维度,其中社区提供的正式社会支持(如活动中心、老年学校)与非正式支持(如邻里互动)共同构成支持体系,通过改善身心健康间接增强生活满意度(瞿小敏,2016)。另有研究将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支持三个指标综合构建为老年人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侯建明、周文剑,2024)。其中,社会资本作为文化适应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路径,城乡地区老年人的城市认同与家乡认同分别发挥促进与阻碍作用(池上新,2021)。如今,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技术切实拓宽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使用互联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探究

此类研究聚焦于互联网使用的直接影响与中介机制作用,并得出了差异化的结论。部分学者支持“网络增益效应论”,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例如,杜鹏和汪斌(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且社区参与在此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中介作用。周晓洁和王晓慧(2020)的研究同样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通过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得以实现。然而,反对观点认为互联网使用的正向效应存在局限性,中国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主要为浅层应用,甚至可能因信息过载而降低生活满意度(吴新慧,2017)。艾略特等人(Elliot et al., 2013)、范英根等人(van Ingen et al., 2017)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或心理福祉之间并无显著关联,其影响可能依赖中介变量的作用。基于此,一种观点强调互联网通过增强社会参与和社区联系(如志愿服务、信息获取)间接提升生活满意度(杜鹏、汪斌,2020;周晓洁、王晓慧,2020),认为社交途径作为重要的中介渠道(范从波、温勇,2023),能够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认知功能与生活满意度的提升(陆杰华、李芊,202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可能替代线下社交活动,导致孤独感增加,但这一机制在中国老年人群中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吴新慧,2017)。后续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效用存在使用的具体情况与老年人群体的差异。就使用的具体情况而言,互联网使用的频率与感知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知产生正向影响(熊春林等,2023);使用不同网络功能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如微信等社交程序能有效促进身心健康(刘杰、郭超,2021)。就群体差异而言,熊春林等人(2023)证实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感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知产生正向影响;然而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互联网对低龄和城市老年人健康影响更显著(侯建明、周文剑,2022)。

(三)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信任为中介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与老年人的本体安全感紧密相关,在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陆杰华、韦晓丹,2021)。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主流研究通常把社会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维度(Putnam,1995;Coleman,1988),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感受(Worchel,1979)。社会信任多指向“一般化信任”(generalized trust),即对社会中陌生人的信任程度(Putnam,2000)。在互联网环境中,以往研究认为互联网有助于整合人际信任关系网络,形成并维护人们的社会资本,使人们对更多社会群体产生认同感与信任感(张加春,2016;Ellison et al.,2010)。然而,高匿名性与复杂性并存的网络世界会导致用户行为难以预测,所以互联网中的信任存在更大风险,建立和维持信任会更困难(Ye & Emurian,2005)。实证研究显示,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社会信任水平更低(赵晓航、李建新,2017)。进一步细分互联网使用的具体情形,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水平有负向影响,不过随着劳动收入和受教育年限的提升,这种负向影响会被削弱(赵建国、王嘉箐,2021)。基于负面信息占优视角,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赵晓航、李建新,2017)。

对信息相对弱势群体的老年人来说,大量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信任存在负面影响。“数字鸿沟”是老年人“触网”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其中的“知识沟”揭示了老年群体因使用技能差异而在信息资源获取方面存在的差异(刘建国、苏文杰,2022),这进而会加剧老年人身心健康方面的差异。以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来源以及在互联网中的社会参与,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这种影响在性别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杜鹏、罗叶圣,2023),因此需要对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持较为审慎的态度。

关于社会信任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结果显示,社会信任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在不同地区和收入群体中均成立(彭代彦、闫静,2014)。针对西北五省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基层政府信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尤为显著,人际信任则通过增强心理健康和未来信心产生积极影响(赵锋、高梦欣,2021)。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维度,对农村老年人来说,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的情感支持、间接的资源获取以及心理健康机制,可能显著提高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Chen,2021)。

由前文可知,既有研究已较为全面地探索了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因素以及互联网使用的作用机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数字化浪潮下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既定事实所导致的城乡数字鸿沟扩大问题,以及农村老年人群体因基础设施薄弱、数字社会化进程滞后导致的数字红利剥夺。其二,缺乏从用户使用方式的视角出发,忽略了不同的使用方式及内容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其三,对于老年人使用短视频这一日益普遍且不容忽视的趋势缺乏具体关注。其四,即便在关注短视频使用的研究中,既有研究在将社会信任视为影响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中介这一视角上仍有所欠缺。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借助专项调查数据,探究农村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23年6月北京大学课题组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开展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50周岁及以上使用过短视频的农村中老年人,调查内容涵盖受访者基本情况、短视频使用情况、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三个部分。本调查采用典型抽样、PPS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有效性。首先,依据区域、经济、人口规模以及中老年使用短视频的综合排名等因素,选取北京、浙江、贵州、河南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直辖市或省份;其次,针对四个直辖市或省份的区或地级市,分别选择一个区或地级市,在本调查中依次为北京密云、浙江台州、贵州遵义、河南平顶山;再次,按照经济和人口规模,在每个省或直辖市抽取相应的区、县,分别是北京密云、浙江台州温岭、贵州遵义红花岗、河南平顶山郟县;最后,在区、县范围内抽取的社区中,于每个社区、村随机抽取25名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本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117份,其中使用过短视频的受访者占比超过七成,能够代表农村中老年人短视频的使用情况。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专项调研问卷中对应的题目是“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选项包括“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本文将前三类合并为“生活不满意”,赋值为0;后二类合并为“生活满意”,赋值为1。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分为两个维度,即农村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频率与使用的具体内容。第一类短视频使用频率的测量包括是否使用短视频与使用短视频的频率。前者对应的题目为“根据大多数情况下的估计,您使用短视频的频率是?”,选项包括“每天都用”“两三天一次”“一周一次”“偶尔用,但少于一周一次”。本文将选择“几乎不用”的赋值为0,表示不使用短视频;其他类别赋值为1。后者针对使用短视频的群体,其中第一类是测量短视频使用频率,将“偶尔用,但少于一周一次”“一周一次”“两三天一次”“每天都用”四个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4分。

第二类为使用内容,根据问卷中“在过去一个月内,您使用短视频进行以下活动的频率是?”,将“从不”“偶尔”赋值为0,表示不经常进行该活动;将“有时”“经常”“总是”赋值为1,表示经常进行该活动。本文选择了“关注其他人,并添加其他人为好友”“浏览其他人的发布内容”“转发、点赞或收藏其他人的发布内容”,即中老年人与非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的三类相关活动,以及“浏览权威机构和媒体账号的发布内容”“点赞、转发或收藏权威机构和媒体账号的发布内容”“关注权威机构”,即中老年人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的三类相关活动,共六项短视频使用内容。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基本人口学特征与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涵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子女数量、是否与子女同住、自评健康以及自评社会地位。其中,“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一变量,将与“子女及其配偶”“孙子女(含外孙子女或重孙子女)”同住的情况标记为“1”,即与子女同住;若同住对象为“配偶(或同住

伴侣)”“父母或岳父母”“其他亲戚或朋友”“保姆”“养老院”“独居”，则标记为“0”，表示不与子女同住。依据“综合您的患病情况（如慢性病）和身体状况，您如何评价您当前的健康状况？”这一问题，来测量农村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将“生活不能自理”评定为1分，“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评定为2分，“基本健康”评定为3分，“健康”评定为4分，得分越高表明越健康。自评社会地位是根据受访者对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与就业状况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打分，分值范围从1到10分，分数越高，自评社会地位越高。

4.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社会信任，该维度包含三个题项，涉及个体层面与信息层面的信任感知。其中，关于个体层面信任感知的题目为“您觉得短视频上的人是否可信”，选项有“非常可信”“比较可信”“一般可信”“比较不可信”“非常不可信”，反向赋分0—4分，分值越大，信任感越强。信息层面的信任感知由“您感觉短视频上虚假信息的比例为”以及“您感觉短视频外的其他网络平台上虚假信息的比例为”这两个问题的得分相加得到，选项为“基本上都是假的”“大部分是假的”“小部分是假的”“几乎没有虚假信息”，正向赋分0—3分，总范围在0—6分，分值越大，信任感越强。社会信任这一维度的分值取值范围为0—10分。

（三）分析策略

本文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与线性回归模型，评估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首先，对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问卷调查的关键变量与控制变量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逐步纳入社会经济特征、家庭支持等变量，借助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是否使用短视频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依据短视频使用对象的差异，分类别探讨短视频使用内容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再次，把中老年人群体划分为中年人、老年人、高龄老年人三个类别，探究是否使用短视频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最后，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讨论中介效应，并将社会信任纳入总效应模型进行分层回归。

四、主要研究发现

(一)主要变量描述分析

由表 1 可知,使用短视频和不使用短视频的两类群体在特定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使用短视频的样本中老年人占 79.64%。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样本平均年龄较低,约为 61.72 岁,低于总体样本的 63 岁;大部分处于在婚状态,比重高达 91.52%;在业比例相对较高,比不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高出 4.3%;受教育程度总体较高,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及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均高于不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样本。其中,社会信任分数均值为 5.50 分,表明使用短视频的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自评社会地位均低于样本平均水平,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为 27.15%,相较于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低 5%;其受教育程度以小学毕业为主,占比高达 52.20%;该群体较为缺乏子女的代际支持,且在“触网”时受技术使用限制的概率较大。需要指出的是,使用短视频的农村中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比例(81.26%)显著高于不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67.75%)。因此,关注短视频使用情况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使用短视频 (N = 1686)	不使用短视频 (N = 431)	合计 (N = 2117)
性别	男性	50.18%	50.12%	50.17%
	女性	49.82%	49.88%	49.83%
平均年龄		61.72	68.02	63.00
婚姻状况	在婚	91.52%	83.06%	89.80%
	不在婚	8.48%	16.94%	10.20%
就业状况	在业	31.91%	27.61%	31.03%
	不在业	68.09%	72.39%	68.97%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0年)	0.06%	7.66%	1.61%
	私塾/扫盲班(3年)	6.35%	8.82%	6.85%
	小学毕业(6年)	46.20%	52.20%	47.43%

续表 1

	变量	使用短视频 (N = 1686)	不使用短视频 (N = 431)	合计 (N = 2117)
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9年)	29.83%	21.81%	28.20%
	高中/中专/职高/技校(12年)	13.11%	7.42%	11.95%
	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16年)	4.45%	2.09%	3.97%
家庭年收入	2万元以下	6.70%	1.39%	5.62%
	2万—5万元(不含5万元)	28.83%	36.19%	30.33%
	5万—10万元(不含10万元)	46.80%	44.55%	46.34%
	10万—20万元(不含20万元)	12.57%	14.62%	12.99%
	20万元及以上	5.10%	3.25%	4.72%
平均子女数		2.03	2.05	2.05
是否与子女同住	是	32.21%	27.15%	31.18%
	否	67.79%	72.85%	68.82%
自评健康 (1—4分)		3.18	2.98	3.14
自评社会地位 (1—10分)		5.30	5.17	5.27
社会信任 (0—10分)		5.50	/	/
生活满意度	满意	81.26%	67.75%	78.51%
	不满意	18.74%	32.25%	21.49%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2展示了关于是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其中,模型1涵盖“是否使用短视频”以及中老年人人口学特征的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添了中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模型3以模型2为基础,增加了中老年人家庭支持的控制变量。模型3的结果表明,短视频使用在1%的水平上依旧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短视频的农村中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是不使用短视频的老年群体的1.45倍。结合活动理论,短视频的互动功能有助于农村中老年人借助线上交友、参与本地事务直播等多种途径,弥补线下社交网络的萎缩,缓解因角色退出、对老化的感受所引发的负面情绪,提升自我效能感。模型3的回

归结果同样反映了各控制变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中,年龄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身体机能下降、数字接入难度相对较大(辛晔、陈友华,2024)等因素有关。然而,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与阶段性差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以及年岁的增长,老年人能够逐渐学会调和行为与观念的冲突,使自身情绪较为稳定平和,进而形成积极的生活心态(骆为祥、李建新,2011),需进一步关注这一机制在不同年龄段中老年人之间的异质性。需要指出的是,自评健康作为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综合性主观判断,直接影响其对生活的整体评价,其内在逻辑是,当老年人认为自身健康良好时,更倾向于对生活状态产生积极情绪(李建新、刘保中,2015),形成“健康自信—生活满意”的良性循环。

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家庭年收入、自评社会地位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自评地位较高的中老年人,其受教育程度可能也较高,更易于跨越使用互联网的技术障碍、克服使用过程中的文字难题(周晓洁、王晓慧,2020);更有可能曾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或在社区积极参与村、镇公共事务,这有助于中老年人更频繁且主动地接入数字生活,增强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归属感与自我效能感,进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孙鹃娟、冀云,2022)。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村中老年人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受到多个维度的系统性影响,正向的综合评价才会显著地给予其生活满意度正反馈。在使用互联网时,老年人倾向于向子代求助,子代传授使用短视频的技巧,会使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沟通更为顺畅,有助于促进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朱秀凌,2018),进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鉴于前述 Logistic 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模型结果的稳健性仍有待检验,因此本文将因变量替换为生活满意度得分变量,据此建立 OLS 线性回归方程模型 4。比较模型 3(主回归模型)和模型 4 的结果可知,由于模型不同,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可认为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 2 是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是否使用短视频	0.400 ** (2.81)	0.423 ** (2.95)	0.372 ** (2.60)	0.161 *** (4.33)
性别 (男性 = 1)	-0.194 (-1.73)	-0.216 (-1.89)	-0.207 (-1.80)	-0.072 *** (-2.60)
年龄	-0.013 (-1.40)	0.0495	-0.027 ** (-2.73)	-0.008 *** (-3.31)
婚姻状况 (在婚 = 1)	0.029 (0.17)	0.007 (0.04)	0.131 (0.68)	0.068 (1.39)
受教育程度	0.020 (1.01)	-0.011 (-0.53)	0.003 (0.15)	0.01352
自评健康	1.183 *** (11.07)	1.152 *** (10.65)	1.165 *** (10.81)	0.397 *** (16.14)
就业状况	/	0.209 (1.62)	0.246 (1.88)	0.070 ** (2.22)
家庭年收入	/	0.244 ** (3.09)	0.224 ** (2.76)	0.047 ** (2.51)
自评社会地位	/	0.125 ** (2.98)	0.130 ** (3.07)	0.039 *** (3.95)
子女数	/	/	0.285 *** (3.48)	0.042 ** (2.29)
与子女同住 (是 = 1)	/	/	0.308 * (2.23)	0.050 (1.58)
常数项	3.28284	-2.372 ** (-2.77)	-2.991 *** (-3.44)	1.612 *** (7.47)
Pseudo R ²	0.100	0.118	0.126	0.190
N	2117	2117	2117	2117

注:模型 1—3 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模型 4 为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括号内为 t 值;*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从使用内容方面来看,本文依据短视频使用对象的差异,将这三个类别划分为“与其他人”或“与权威机构”的相关活动。表 3 显示,“关注权威机构”对农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这证实了保护动机理论(Rogers,1975)

的观点,即个体可通过采纳权威建议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提升控制感与生活满意度。权威机构(如政府、医疗机构、村委会)发布的信息有别于其他用户,具有制度性信任背书,所发布的信息通常可信度较高,能降低农村中老年人的信息筛选成本与风险感知。相较于基于算法推荐的被动“浏览”,“关注权威机构”是农村中老年人在短视频使用过程中主动获取高信度、高质量信息的尝试,是中老年人数字能力提升的主要体现。通过订阅权威内容,老年人扩大了自身在权威信息方面的“曝光度”,逐步掌握信息检索与验证技能,有助于提高其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借助短视频的可视化、形象化、亲民化呈现,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信息的权威机构能帮助老年人更轻松地掌握近期热点政策与下沉举措,有助于减少其因信息误判造成的利益损失。这一系列路径能帮助老年人树立“对网络信息有一定辨别能力”的积极自我信念,促进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

表 3 短视频使用内容对农村中老年人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与其他人相关的短视频活动		与权威机构相关的短视频活动	
关注其他人的账号	-0.003 (-0.04)	关注权威机构的账号	0.135* (2.28)
浏览其他人发布的信息	0.076 (1.16)	浏览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	0.055 (0.92)
与其他人互动 (点赞、评论、转发)	0.047 (0.69)	与权威机构互动 (点赞、评论、转发)	0.069 (1.15)

注:表 3 呈现的结果是对如表所示的六个自变量分别进行 Logistic 回归所得。括号内为 *t* 值;*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在法定退休年龄的现实性受到挑战,亟须重构老年人年龄划分标准(原新、张圣健,2023)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不同年龄群体的农村中老年人相异的短视频使用状况与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与样本分布,本文将农村中老年人分为三组:把 50—59 岁的界定为中年人,60—69 岁界定为低龄老年人,70 岁及以上界定为中高龄老年人。结果显示,是否使用短视频对农村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仅在低龄老年人群体中有着显

著的正向作用,在中年人、中高龄老年人中虽有正向影响但作用并不显著(表4)。其中,使用短视频的低龄老年人比不使用短视频的低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度高2.2倍,也就是说是否使用短视频对不同年龄群体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异质性。一方面,处于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由于退休、子女离家等原因,容易面临社会角色的丧失与情感孤独。短视频的社交属性和信息获取功能能填补这一空缺,为老年人提供了低门槛的社会再融入渠道,比如通过线上互动拓展弱关系连接(如维系异地亲友),这种“线上线下的联动效应在低龄老年人中更为显著。中年人仍处于职业活跃期,其社会角色与线下社会网络相对完整,短视频的补偿作用被现实社交网络弱化(周冬、李武,2024),短视频使用与其情感补偿的需求匹配度总体较低。中高龄老年人可能因身体机能衰退或数字技能不足,难以深度参与短视频互动,致使短视频使用之于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受限。同时,中高龄老年人面临着使用功能受限与网络诈骗的风险(陆杰华、韦晓丹,2021),其获得积极收益的难度更大。

表4 分年龄是否使用短视频对农村中老年人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中年人	低龄老年人	中高龄老年人
是否使用短视频	0.548	1.163 ***	0.1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²	0.139	0.121	0.169
N	953	665	499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三)中介效应分析

社会信任这一中介变量由三个题项加总构成,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0.680,表明该量表具有中等程度的内部一致性。KMO 取样適切性量数为0.6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137.293,自由度为3,显著性水平为0.000,远小于0.05,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足以进行因子分析,效度较好。

依据中介效应分析机制,模型的回归系数需统一尺度。所以,本部分将因变量处理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连续变量,并把社会信任纳入总效应模型

中进行分层回归。表5的模型1显示,短视频使用频率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2以社会信任为因变量,短视频使用频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显示短视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以生活满意度得分为因变量,短视频使用频率和社会信任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短视频使用频率依然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08%。综上,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成立。

表5 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生活满意度	社会信任	生活满意度得分
性别	0.01634	0.028 (1.230)	-0.080** (-2.668)
年龄	-0.011** (-3.950)	0.001 (-0.161)	-0.011** (-3.957)
婚姻状况	0.028 (0.490)	0.049 (1.147)	0.020 (0.361)
受教育程度	-0.007 (-1.274)	0.016** (3.847)	-0.009 (-1.717)
自评健康	0.491** (15.521)	0.052* (2.516)	0.412** (15.301)
就业状况	0.094** (2.733)	0.087** (3.308)	0.081* (2.363)
家庭年收入	0.033 (1.684)	-0.039** (-2.639)	0.039* (1.993)
自评社会地位	0.018 (1.769)	0.024** (3.096)	0.015 (1.420)
子女数	0.035 (1.770)	-0.002 (-0.130)	0.035 (1.796)
是否与子女同住	0.032 (0.966)	0.059* (2.335)	0.023 (0.702)
常数项	1.982** (8.918)	-0.567** (-3.357)	2.068** (9.328)
短视频使用频率	0.049* (2.574)	0.046** (3.216)	0.042* (2.213)

续表 5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生活满意度	社会信任	生活满意度得分
社会信任	/	/	0.150** (4.702)
R ²	0.171	0.038	0.182
Pseudo R ²	0.166	0.032	0.176
F	F = 31.409, <i>p</i> = 0.000	F = 6.012, <i>p</i> = 0.000	F = 30.988, <i>p</i> = 0.000

注:括号内为 *t* 值;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海耶斯(Hayes, 2009)认为,相较于 Sobel 检验以及 Baron & Kenny 因果步骤法,连续抽出放回的 Bootstrap 方法在中介效应检验方面更具优势。表 6 显示,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这表明社会信任在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得分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在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社会信任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表 6 社会信任的 Bootstrap 中介模型检验

效应	效应系数	95% CI		标准误 SE 值	结论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0.007	0.005	0.079	0.003	部分中介
直接效应	0.042	0.005	0.079	0.019	
总效应	0.049	0.012	0.086	0.019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试图揭示数字技术普及与老龄化进程交织中的复杂社会效应。研究发现,对于使用短视频的农村中老年人群体而言,存在着显著的群体分化。使用短视频的农村中老年人群体占总体的 79.64%,其平均年龄显著低于不使用农村短视频群体的平均年龄(68.02 岁),这反映出高龄群体存在明显的

数字排斥。不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群体相对集中于高龄、低教育、低收入及健康弱势人群,其生活满意度低于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群体,这一结论与既有研究结论相契合:在接入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老年人更容易跨越使用互联网的技术限制与文字障碍(周晓洁、王晓慧,2020);就效用而言,互联网使用对低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侯建明、周文剑,2022)。

就使用短视频的影响而言,使用短视频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验证了活动理论(Havighurst,1961)在互联网使用视域中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的理论预期。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及家庭支持变量后,使用短视频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此研究结论印证了数字代沟理论(周裕琼,2014)的补偿机制假说,即短视频通过降低社会参与的门槛,帮助农村中老年人通过关注亲友动态、参与兴趣社群的方式重建线上社会网络,从而缓解因社会角色退出引发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地,本文发现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异质性。低龄老年人(60—69岁)通过使用短视频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机制,实际上受到了缓解社会角色退出的情感需要与数字素养的双重作用:较中年人而言,其社会网络相对不完整;较中高年龄老年人而言,其技术适应能力较强,更易通过短视频获取健康信息、参与社交互动,而中高年龄老年人因身体机能衰退、技术学习能力下降,更易陷入技术边缘化的困境(陆杰华、杨茜茜,2023)。因此,低龄老年人从短视频使用中所获得的情感收益、短视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关注权威机构”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权威机构内容的技术赋能效果显著优于与其他人社交的内容,这一机制体现了数字技术与社会信任的制度性协同。权威机构的制度性信任背书(如政务类短视频内容的官方认证、信息权威性)增强了农村中老年人对公共信息的可靠性认知,从而降低网络风险感知(靳永爱等,2024),有助于帮助农村中老年人降低信息筛选成本、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主动“关注”的行为也反映了农村中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且他们有意愿进行数字接入。

最后,社会信任在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短视频使用通过构建线上社会网络,打破农村中老年

人的地域限制,促进社会信任从线上向线下迁移(Putnam,2000)。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即农村中老年人只有短视频使用频率较高,才能积累社会信任,降低农村中老人在医疗资源获取、社区事务参与等方面的信息获取成本,并增强中老年人的资源整合能力(姜山等,2022)。高频使用学习成本低、互动简易的短视频,适配了农村中老年人的数字使用门槛,帮助释放其主体性与空间可见性,鼓励农村中老年人能够在互联网上获取更具权威的信息、自主“加固”既有的线下社会网络与拓展线上的社会网络,均有助于中老年人提升其社会信任水平,进而经由满足其情感需求、改善生活现状、获得自我效能感的诸多途径正向促进生活满意度,形成“使用—信任—满意”的传导链条。

综上,本文揭示短视频赋能的本质是技术适配、社会资本重组与制度信任修复的三元协同。既往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增益论”与“有限论”的分歧(吴新慧,2017;Elliot et al.,2013)。本文认为,短视频作为一种低门槛、高情感卷入、强算法驱动的新型媒介形态,其赋能机制需置于城乡数字鸿沟与老年生命历程转型的双重视域下解释,以阐明其理论逻辑。首先,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补偿性接入是短视频赋能的起点。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中老年人面临双重“数字鸿沟”:一方面是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导致的物理接入鸿沟,另一方面是数字素养差异形成的能力使用鸿沟。短视频的“视听化交互”(如方言语音、手势操控)能够显著降低农村中老年人的认知负荷,为其提供跨越传统互联网壁垒的补偿性接入通道。其次,活动理论的线上延伸与社会参与的重建是短视频赋能的核心机制。社会角色的退出(如退休、空巢)导致的价值感丧失是中老年人,尤其是农村低龄老年人面临的普遍问题。活动理论(Havighurst,1961)强调保持活跃参与对晚年福祉的重要性。短视频通过替代性参与及公共性参与的两重机制,如浏览子女发布的生活动态、观看村务直播与政策解读,不同程度地补偿了农村中老年人线下参与的不足。最后,社会信任是短视频赋能必不可少的中介。权威机构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具有制度性背书和较高的信息可信度,农村中老年人主动关注此类内容,显著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惧感,形成基于权威信息的“保护性信任”(Rogers,1975)。

这增强了他们对生活的控制感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感知,从而产生强烈的安全感,同时也是对生活满意的重要基石。与此同时,短视频的互动功能(如关注、点赞、评论)促进了农村中老年人线上的人际连接与情感交流。短视频平台算法通常推荐同地域、同兴趣内容,促使用户能够接触到原本线下弱连接的同乡或兴趣相投者。通过观看其日常生活分享,农村中老年人得以基于共同背景或兴趣验证他人可信度,在线上环境初步建立社会信任。这一社会信任易于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强关系基础上(费孝通,1947)迁移至线下,增强对邻里、社区成员的信任感,进一步强化具有信任基础的、更紧密的情感支持网络。这种“线上启动—线下循环”的情感支持循环,能够有效缓解农村中老年人的孤独感,显著提升其幸福感,形成更为积极的生活评价。其中,低龄老年人(60—69岁)作为处于“数字融入黄金窗口期”的群体,其相对更优的生理机能与认知储备为学习并适应短视频技术提供了基础能力保障;同时,他们正处于社会角色和家庭结构的关键转型阶段,对通过短视频重建社会连接、寻求新身份认同有着迫切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与短视频提供的参与渠道高度适配。更重要的是,他们尚未完全脱离原有线下强关系网络,使得线上初步建立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能更高效地嵌入并强化既有的现实社会资本,形成线上信任向线下支持的良性转化闭环。因此,低龄老年人在技术接受度、需求契合度及信任转化效率上的综合优势,与其生命阶段特征紧密相连,构成了该群体显著获益于短视频使用的深层理论逻辑。

在积极老龄化战略与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互联网及短视频技术为农村中老年人提升生活满意度、实现技术赋权提供了新路径。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帮助老年人共享数字生活”的要求,以及《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目标,本文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政策体系。首先,实施“精准适老”数字服务工程。依托国家“智慧助老”行动,开发农村适老化短视频平台功能模块,强制推行老年模式,如方言语音交互、防误触设计、大字幕慢语速等,并将适老化改造纳入《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考核指标。其次,构建“信任导向”内容治理机制。根据既往发布内容与老年用户需求,建立银发内容白名单,对农村中老年人最可能关

注的权威机构类别,如政务类与健康类短视频账号实施权威认证,再经由算法加权推送至农村中老年用户,针对虚假养生信息、涉农诈骗开展定向治理,降低网络风险对信任资本的侵蚀。如此,能够有效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在短视频使用平台中的社会信任水平,为乡村振兴与积极老龄化战略提供底层信任支撑。最后,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融合。依托《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推动基层政务短视频账号建设,拓展农村中老年人的线上与线下社会参与途径,将线上建立的社会信任延伸到线下,并鼓励农村中老年人切实参与到线上与线下的政务实践中。例如,在直播中采用方言讲解与连线实时答疑,在直播后生成带“大字幕”的回放视频,既符合中老年人的信息接收习惯,又能够以数字留痕的方式增强程序合法性。由此,便能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深度融合,推动短视频从娱乐工具向“信任建构—社会参与—福祉提升”的综合平台转型,为提升我国农村中老年人福祉、破解城乡老龄化差异问题、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中国式现代化方案。在数智化全面渗透城市与农村社会,但城乡互联网普及率仍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以数字融入促进社会信任、以线上互动赋能线下行动,是当今老龄化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然而,本文因采用横截面数据设计而存在因果推断的局限性,对于短视频使用内容中被动获取的信息(算法推荐的直接结果)以及社会信任相关维度的测量,需要更加具体明确。后续研究可追踪同一群体中老年人的短视频使用行为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可引入混合研究方法,收集并整合农村中老年人关注最多的信息类别及其账号主体,结合对社会信任相关维度的考察,重点关注农村中老年人对高风险内容的识别能力以及信任修复的可能性。这些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为制定分群体、分场景的数字包容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 池上新,2021,《文化适应对随迁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杜鹏、李子洋,2024,《老龄社会治理:学科交叉视角下的研究反思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4期。
- 杜鹏、罗叶圣,2023,《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吗?——基于使用差异视角的考

- 察》,《人口研究》第6期。
- 杜鹏、汪斌,2020,《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人口研究》第4期。
- 范从波、温勇,2023,《互联网使用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第3期。
- 冯晓黎等,2005,《经济收入及婚姻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中国公共卫生》第12期。
- 郭志刚、刘鹏,2007,《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侯建明、周文剑,2022,《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理及异质性分析》,《人口学刊》第3期。
- 侯建明、周文剑,2024,《社会资本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人口学刊》第3期。
- 姜山等,2022,《数字融入、社会资本与老年心理健康——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治理研究》第5期。
- 靳永爱等,2024,《数字时代的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人生活——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人口研究》第1期。
- 黎梦兵、吴勇,2020,《新媒体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基于“深度伪造”短视频视角》,《理论月刊》第12期。
- 李德明等,2006,《北京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1期。
- 李德明等,2008,《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7期。
- 李建新、刘保中,2015,《健康变化对中国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的影响——基于 CLHLS 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口与经济》第6期。
- 李建新、骆为祥,2007,《社会、个体比较中的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刘吉,2015,《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数据的分析》,《老龄科学研究》第1期。
- 刘建国、苏文杰,2022,《“银色数字鸿沟”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人口学刊》第6期。
- 刘杰、郭超,2021,《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以微信、微信朋友圈和手机支付的使用为例》,《人口与发展》第6期。
- 陆杰华、李芊,2022,《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探究——基于 CLASS 2018 的数据检验》,《西北人口》第5期。
- 陆杰华、韦晓丹,2021,《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人口研究》第3期。
- 陆杰华、杨茜茜,2023,《指尖上的互动:农村老年人短视频使用与社会融入探究——基于遵义市G村和Q村的质性观察》,《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骆为祥、李建新,2011,《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人口研究》第6期。
- 彭代彦、闫静,2014,《社会信任感与生活满意度——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部分数据的实证

- 分析》,《当代经济研究》第6期。
- 瞿小敏,2016,《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基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人口学刊》第2期。
- 孙鹃娟、冀云,2022,《居住方式、居住环境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基于 CLASS2016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建设》第4期。
- 同钰莹,2000,《亲情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口学刊》第4期。
- 吴新慧,2017,《老年人互联网应用及其影响研究——基于 CSS(2013)数据的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向运华、姚虹,2017,《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第2期。
- 辛晔、陈友华,2024,《短视频视角下“银发冲浪族”的数字化融入》,《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熊春林等,2023,《互联网使用、基层政府信任感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 CSS2019 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社会》第3期。
- 原新、张圣健,2023,《长寿时代老年人的年龄重构及退休政策调整》,《人口与经济》第4期。
- 张加春,2016,《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中州学刊》第6期。
- 张文娟、李树茁,2005,《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 张霞、杨一帆,2017,《我国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老龄科学研究》第2期。
- 赵锋、高梦欣,2021,《社会信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基于西北五省区的社会调查》,《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赵建国、王嘉箐,2021,《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第5期。
- 赵晓航、李建新,2017,《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基于 CGSS2013 数据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第1期。
- 周冬、李武,2024,《莫道桑榆晚:短视频观看行为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图书情报知识》第5期。
- 周坚、何梦玲,2019,《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 CLHLS2014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老年学杂志》第7期。
- 周晓洁、王晓慧,2020,《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 CLASS 2016 数据的实证分析》,《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周裕琼,2014,《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2期。
- 朱秀凌,2018,《手机技术反哺、亲子沟通与父母教养方式——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分析》,《新闻大学》第4期。

- Chen, H. 2021, "Internet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55.
- Cheng, X. et al. 2024, "Internet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Current Psychology* 43.
-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Elliot, A. et al. 2013, "Predictors of Older Adults' Technology Us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Well-Being."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9(5).
- Ellison, N. et al. 2010,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 Gutiérrez, M. et al. 2024, "Age, Technolog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Are They Directly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ealthcare* 12(23).
- Havighurst, R. 1961,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1(1).
- Putnam, R.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ogers, R. 1975, "A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of Fear Appeals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91(1).
- Tang, Y. et al. 2024,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on Rural Older People's Mental Quality of Life: A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Heliyon* 10(17).
- van Ingen, E. et al. 2017, "Does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Buffer Against Well-Being Loss When Older Adults Face Reduced Functional Abil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0.
- Worchel, P. 1979, "Trust and Distrust."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S. I.]: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Ye, D. & H. Emurian 2005, "An Overview of Online Trust: Concepts, Elements, and Implica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1(1).

责任编辑:王誉梓、张继军